

大家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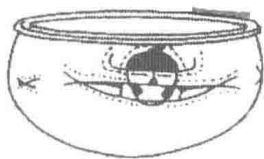
考古寻根记

苏秉琦 著



考古寻根记

苏秉琦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寻根记 / 苏秉琦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9.10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4953-1

I. ①考… II. ①苏… III. ①考古学—普及读物
IV. ①K8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0072号

总策划: 安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王铁英

· 大家小书 ·

考古寻根记

KAOGU XUNGENJI

苏秉琦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953-1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苏秉琦先生《考古寻根记》导读

郭大顺

1987年苏秉琦先生应《中国建设》杂志之邀，撰写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以下简称《考古寻根记》）。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里，先生的视野，时间跨越从距今五六千年间到四五千年间，延续至两千年前，地域从中原拓展到东南和北方地区，内容以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为重点，虽然高度概括，但由于是以考古实例进行的具体分析，很快得到社会认可，当年《新华文摘》转载后，又以“内容的科学性”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题。

从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和此前几年先生一系列的讲座、论文，如收入本书的《文化与文明》、《中华文明的新曙光》等可以看出，包括《考古寻根记》在内的这组有关文明起源的专

题文章写作的直接原因，是1983—1986年辽宁西部山区的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发现报导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推动了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讨论，先生在这一牵动亿万中华儿女心扉的学术大潮中，始终站在第一线，连续提出一系列指导性理论和观点：早在1983年东山嘴遗址刚发现时，他就意识到此处遗址北方南圆的布局具有古代中国建筑、特别是祭祀礼仪性建筑的传统特点，在《座谈东山嘴遗址——我的一点补充意见》一文中，将东山嘴遗址的祭坛与隔年发现的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一起，视为近于古人传说的“郊”、“燎”、“禘”一类重大祭祀仪式留下的遗迹；接着是1985年的两次讲座活动，先是在辽宁兴城讲座时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阐述无论西辽河流域还是田野考古开展较早、工作基础较好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最初的古城古国的形成都源于当地的古文化；一个月后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会上，先生进一步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冢和玉龙凤等玉器，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北南碰撞产生的文明火花，更具体称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特征的勾云形玉器为“玉雕玫瑰”，寓意其造型有对仰韶文化玫瑰花卉纹因素的吸收，又考证出三北地区（即冀北、晋北、陕北与内蒙古中南部）是由仰韶文化典型器小口尖底瓶演变而来的三袋足器斝和鬲的发源

地，后者被誉为“中华古文化标准化石”；而山西襄汾被视为陶唐氏（尧）都城的陶寺遗址，所出源自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自三北地区的鬲鬲和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琮、俎刀等，具有包含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多元文化因素的综合体性质。从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各自的标志物——彩陶玫瑰花卉纹与彩陶龙鳞纹和玉龙的“花（即华）与龙”的碰撞融合，到由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中”的“中国”观念形态和政治实体的形成，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里的“华人、龙的传人与中国人”，终于在距今五千年前后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在文化交流推动下各地先后跨入文明门槛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根脉，先生称这几个遗址点及贯穿其间的交流线路为中华民族总根系的“直根”。

所以进入90年代，先生提出从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号召，已是水到渠成。为此，已步入高龄的先生仍身体力行，将考古寻根向前追溯到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距今八千年前后的玉器与河北张家口泥河湾在百万余年的地层发现的人工石制品。查海与此后内蒙古教汉旗兴隆洼遗址所出玉玦和玉匕形器，一律以透闪石软玉为料，精工磨制，其选料与制作的专业化和使用的专门化，反映当时社会分工已导致社会分化；泥河湾遗址的石器则与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石器的特征相同，具有中国和东方旧石器时代特有的“以向背面加工的石片

石器为主体的小石器传统”，据此先生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归纳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将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过程概括为“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古国”指距今五千年前后以古文化为基础产生的诸多古城古国，在个性充分发展的同时又在频繁交汇中向一起汇聚，是为“共识的中国”；“方国”指夏商周三代，为包括夏商周王朝在内的诸多方国林立的形势，《诗经》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王室天下观尚有待实现，是为“理想的中国”；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建立起统一多民族的大帝国，是为“现实的中国”。又将文明起源的考察范围延续到秦汉以后北方诸民族直至满族的开国史，从而在“三部曲”之后又提出国家形成“三模式”即“原生型”、“次生型”与“续生型”的概念。“原生型”见于北方地区，因为北方在近万年已出现社会分工到社会分化，文明起源进程先走一步；以中原为“次生型”，因为中原是在四周主要是北方和东南方推导下，经历从洪水到治水等外力因素进入文明社会的；先秦以后的北方草原地区为“续生型”，因为这些北方民族的国家形成过程也大都经历过古国—方国—帝国这三个阶段。以上所论见于本书收入的三篇重建古史和《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

等文章中。1994年先生应邀为“海峡两岸历史与考古整合会议”撰写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中，更进一步将“民族文化传统”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与国家起源即文明起源一起列为国史的核心。

以考古复原中国上古史这一几代学人探索不息的重大课题，虽然是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引发的，但苏秉琦先生在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里迅速加以完善并不断提炼和升华，却是他长期甚至可以说是毕其一生学术积累和思考的结晶。正如《考古寻根记》一文开头所说，这是“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取得的成果。

谈到半个多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如许多学科一样，考古学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苏先生在论著中经常有对这方面的回顾和反思。其中谈的较多的，是历史学和考古学普遍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用社会发展史代替全部历史，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一是以中原为中心、汉族为中心、王朝为中心的大一统观看待在中华广阔区域活动的多民族创造的历史。这两种倾向根深蒂固，对学科的发展影响大、延续时间长，苏先生称之为两个“怪圈”。为绕出这两个怪圈，先生坚持紧紧立足考古实践，又不懈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在方法论上时有创新。

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秉琦先生主持陕西宝鸡斗鸡台先秦墓葬发掘和他的考古类型学奠基之作《瓦鬲的研究》中，就有了商周秦不同源、各有发展脉络的想法。50年代初在西安附近考古调查报告中提出关中地区有别于其以东的河南后冈三迭层的文化一（仰韶文化）、文化二（相当于龙山文化）和文化三（周文化），将洛阳中州路两周时期墓葬在分期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的分析，都是这方面的尝试，不过真正“解悟”是此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

在50年代末，仰韶文化是史前文化中发掘面积最大、材料积累最为丰富、讨论也最多的考古学文化，也是苏先生选择的重点实践对象。当时受大跃进形势波及，考古界有对陶器分类排比“见物不见人”的批判。先生于逆境中仍坚持类型学研究，在陕西华县泉护村等遗址纷繁庞杂的诸多内含中，选择特征鲜明、变化幅度大、节奏快、序列完整的小口尖底瓶，彩陶中的蔷薇科和菊科花卉、鱼和鸟图案等三类共六种文化因素，进行综合的层位、类型学的排比，比较的结果是揭示出一幅动态的史前画卷：统一的仰韶文化可以划分为半坡和庙底沟类型，这两种类型既独立发展，各有自身特征、发展道路和渊源，又有相近的前后发展阶段和相同的分布中心地域，相互又紧密依存，是为史前时期活动在以华山脚下为核心的八百里秦

川内外的两个平行发展的人们共同体；还分析出仰韶文化后期已出现氏族制由上升走向瓦解的大量因素和中心区东部发展快于西部的不平衡性现象。这就是苏先生那篇著名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写作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收入本书的《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给青年人的话》、《从“瓦罐排队”谈起》对此都有论及。

这是不同于以往对考古文化遗存总停留在静态的定性描述，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把仰韶文化作为运动物质对待，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研究成果由具体的陶器和花纹的演变规律，深入到社会、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达到了“由物见人”的目的。由此先生领悟到，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需要做深层理解，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各专门学科理论并不属于同一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直接回答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有关章节、词句、论点和自己的研究论著镶嵌在一起的“生搬”不行；学习苏联初期经验，把考古学简单理解为物质文化史的“硬套”也不行。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结论只有一个：走自己的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建本学科自己的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体系。

从此，苏先生将考古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探索推向全国范

围。随着七八十年代各地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开展，先生的足迹也踏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先后对山东大汶口、龙山，广东石峡、江西印纹陶文化，江浙地区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史前文化，燕山南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江淮地区、内蒙河套地区、甘青地区、四川古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并于80年代初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区是块块，系是条条，中国人口密集地区以新石器时代为主可以分为六个大区，但这一理论远不限于分区，其实质是在考古文化区划分和建立各自发展序列的前提下，揭示出各文化区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大致同步，又有先有后，相互交流，又有主有次。中原以外地区先走一步，或较早产生先进因素的情况屡见不鲜。各区域的交流经常不是由中原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汇聚，这一文化发展态势和关系的导向，既见于史前和青铜时代，也见于先秦以后。这与以往以中原为中心，以王朝为中心，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有很大的不同，却反映出各地区、各民族共同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发展做出的贡献。

由于这一理论是从几十年考古实践过程中归纳出来的，又适应了我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由中原地区迅速向全国各地铺开的

新形势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一经提出，立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明显加速，直接导致的，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酝酿发生的社会大变革，从物质到精神领域在各区域陆续被辨认出来，文明火花在中华大地处处闪现，如满天星斗，遂促成了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持续开展，至今仍方兴未艾，先生的考古寻根和文明观也得以逐年完善。这已如前述。

中国考古学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也为考古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条件。对此，苏秉琦先生经常引用《庄子》中的两句话作比喻，一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庄子·天下篇》：“至大无外，唯之大一，至小无内，唯之小一。”），一是《庄子·养生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前一句话是说，学科方法论上从微观入手，要做到如生物学那样的分子水平，到宏观思维如具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的创建，这是衡量中国考古学是否成为真正科学的标准；后一句话是在比喻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过程，目前已从“皆牛也”，认识到“无全牛”，要不断追求的目标是进入“游刃有余”的水平和境界。其实，这也是对苏秉琦先生本人学术历程和在掌握考古方法论上已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的形象比喻和真实写照。

写到这里要提到的是，考古界内外都熟知苏先生摸陶片

的“功夫”。每到那时，陪同者总会被他的专心致志和观察事物的细微所吸引，但有时不免又感到有些神秘。对此，收入本书的《给青年人的话》一文中，先生回顾他整理斗鸡台发掘材料时“如痴似呆”摸瓦鬲的经历，用哲学的思辨，回答了大家的不解：“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决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决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阅读苏秉琦先生的文章，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先生始终重视学科发展的社会背景及与现实的关系。这同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收入本书的《斗鸡台考古见闻录》一文，记录了青年时代的苏先生对社会底层的细微了解、同情和“复兴国家与民族”的忧国忧民情怀，故早已立志于将个人与学科的发展融为一体，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信念。随着在理论指导下学科的健康发展，先生的这一信念也越来越坚定。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刚创建时，先生就提出这一理论的最终目标“是阐明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基础结构及其形成的过程”，从而为认识中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做出贡献。文明起源研究也不限于文明的标准

和时间的讨论，其根本目的在于回答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根本原因。在即将跨进21世纪时，先生提出“走向世界、面对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强调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问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看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的民族精神和灵魂；中国考古学对当前面临的重建人类与自然界的的关系也可提供完整的借鉴材料等。先生将这些思考和论述，归纳为古与今、中国与世界的“双接轨”，写入1997年出版的他的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

这里要特别提到，先生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区系的中国与区系的世界”和“人类文明一元性”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观点。从区系的中国看世界，是中国面向大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块，分别与世界的旧大陆和环太平洋的两大块相衔接；人类文明一元性，指地球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差别虽然多种多样，但发展阶段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时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闭的。收入本书的《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一文的结尾也说到：“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这篇访谈录刊

于1997年7月香港《明报月刊》，是苏先生最后一篇著作，所以，“人类文明一元性”可视为先生最后的学术思考。

先生在晚年常常说道：“我的大半生的经历、成长过程和这门学科、这个事业是同步的。因此，我有一个信念，把我一生所学、所知、所得的一切公之于世，这是我的职责。”先生重视考古的大众化，更强调大众化与科学化的辩证关系。《大家小书》面向普通读者，通过这个平台把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大众共享，会使读者对考古学有更多了解，对考古学重建的中国古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对考古学在现实与未来的作用，有更深入的思想与讨论，这也是苏秉琦先生为考古学科奋斗一生的最终心愿。

2019年6月写于英国白金汉郡AMERSHAM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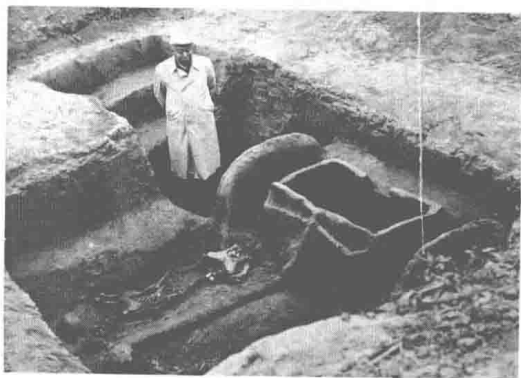
在昆明黑龙潭
1939年



高阳县全和工厂的大门口
1933年



在侯马工作站工作



在琉璃河遗址
1983年11月